

编席匠：巧手编织给生活添彩

□晚报记者 朱保彭 文/图

编席匠，通俗地说就是专业从事用高粱秸秆或者是芦苇秸秆、香蒲等为材料编织席子的工匠。在我国，编席匠有很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编席匠有很广阔的市场，各种各样的席子从编席匠手中编织出来，图案也不相同。目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编席匠的身影已经很难看到了。过去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手工席子正在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工艺所代替，编席这种传统工艺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编席是一门古老的工艺



很早就听说沈丘县范营乡集村是个编席之乡，而且有很悠久的编席历史。年前，记者专程到该村采访，遗憾的是，过去男女老幼都从事编席行当，而如今，很多人都改行了。现存的几个老编席匠已经不再专门编席了，偶尔练练手艺，也都是自己用，不再当商品去卖了。

编席匠张前进已经70岁了，他从15岁就开始学习编席，经他的手编织出的席子有10000多领，到了2000年之后，他就歇业了，因为农村集市上手工编织的席子很难卖出去了。只有在年轻人结婚时，按传统的习俗定制一领或两领席子作为谢礼用。

张前进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高

粱秆加工成的席子是附近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秋收以后，村民们开始编织席子。虽然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所经的工序却不少于30道，如编一领尺寸为一米六乘两米七见方的红席，从“开杆子”到“成品席”，需要五天时间才能完成，还得是从早到晚不停地编，可见制作工艺的复杂。若按工艺过程的先后顺序来分，可将这些繁杂的工序分为秫秸秆处理、篾子整形准备以及席子编织三个重要阶段。

高粱秆收获后，将连根带叶的秸秆散开，然后趁湿一根一根放到“刮篾子板”上，用“垛秫秆刀”快速将根剁去，这叫“去根”。“刮篾子板”多用茶杯口粗细的枣木或梨木制成，材质坚硬，是“去根”和“刮



篾子”等工序中用以固定和控制力量平衡的必备工具。“去根”后的秸秆拿一些细小的秸秆编成五道结捆扎好，称作“捆杆子”，再将秸秆部分放在铡刀下“剔梢”，剔除的秸秆在当地基本作为饲料或燃料使用。除根去梢后的秫秆基本为二米六、七的长度，刚好符合席子的尺寸需要。解开绳扣，接下来则是妇女们较为熟悉的工序“刮叶子”。“刮叶子”时，编席匠席地而坐，左手握秸秆，右手大拇指顶住“刮叶刀”的上部刀口，秸秆同时穿过右手，刀口抵住秸秆骨节，从秸秆根部到顶部，左手向里转动，同时右手稍用力便可刮掉骨节间的叶子。刮完叶子，再把裸露的秸秆捆扎起来。

编席是一项苦力活



张前进介绍说，编席匠的手一个冬天都是皴裂的，手上会划出很多的小口子，即便再熟练的编席匠要想使每一根秸秆都被均匀、整齐的破开而不划伤手指，也绝非易事。编席匠每编出一领席子都有几次被划伤的经历。高粱秆或芦苇要一根一根破开直至成坯，没有执着的精神和平稳的心态是无法想象的。

起初，编席匠先将捆起来的杆子解开摊平，然后先将每一根完整秸秆从中间劈拉成两半，俗称“打半子”或“开杆子”。操作时，编席匠左手握杆推送，右手拿刀劈进，一送一迎，一推一进，身体也随着手部动作

有节奏地移动，十分灵巧快捷。对半劈开后的秸秆叫做“坯子”，劈好的“坯子”要平摊到地上晒，晒干后则用五根草绳或废掉的细“坯子”捆扎起来，谓之“捆坯子”。这样，收获来的秫秆经过这些工序的加工处理后，便可存放起来，等待冬闲时候的来临。秸秆整理工作主要由妇女来完成，材料处理及损失率的高低与妇女技艺好坏有着直接联系。

张前进说，在种类繁多的席子当中，要数红席最上档次了，而且红席在当时的农村是喜庆的象征。红席因其编织严密、纹理清晰、四角端正、编道整齐、色彩艳丽、无毒

无味且具有光滑柔软、结实耐用等特点而深受民众喜爱。在生产队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领席子。红席是人们结婚用的必备品，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很高档的身价。一些心灵手巧的编席人，在传统的图案基础上，大胆创新，编出了“龙凤呈祥”、“百鸟朝凤”等字样和花纹图案，给普通的生活用品赋予了别样的文化韵味。而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红席编织条件的艰辛，近年来这门传统手工艺日渐衰落。在生产队靠手艺挣工分时，每年都会收新徒弟，而今这个行业日落西山，再也无人问津了。

讲古

张之洞爱读书 与两官员的仕途兴废

■马斗全

官员因上司爱好而仕途兴废之事，古往今来皆不鲜见。张之洞也有兴趣爱好，爱读书求学问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清季重要军政大员，张之洞在近代史上还是一个著名的文人。他十六岁中举，步入仕途后，不管政务和军事多么繁忙，从不废读书求学问。清代巡抚一般都是有学问者，张之洞的学问又比一般巡抚要大得多。

其所著《书目答问》一书，为重要书目著作，至今仍受到当代学者的普遍重视，允为名著，广为人知。而他喜好读书并要求属下也多读书的事，人们知道的似乎并不多，这里讲他在山西劝读事。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时，组织人员修《山西通志》，由府学教授杨笃总负其责，他自己也亲自参与。杨笃所藏有关金石资料中有“勾吴鉴”，又作“公吴鉴”，张之洞与杨笃都认为“勾”与“公”为声转假字，但是却找不到依据。

有个陕西人叫王纬，当时在山西当个拔贡出身的小官，还不知因何故被降职。这位王纬写信给张之洞，引《仪礼》郑注“勾亦作

公”为证。张之洞读信后知此人勤于读书而博学，非常高兴，便为他恢复原职。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张之洞视王纬为友，常常降贵屈尊去王纬那里倾谈。以致有些人不明真相，还以为王纬与张之洞是同窗呢。

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乡试，身为巡抚的张之洞亲任临监。因为要在考场待一个月，便调王纬为收卷官，并让王纬再找一位博学者来做事，为的是谈学问，驱寂寥。王纬听说榆次县令吴某的爷爷是大学者袁枚的外孙，吴某又是知名文人潘文毅的女婿，心想这位吴某应是饱读诗书的人，便请了来。

谁知这位吴县令却是一个不读书的主儿，什么学问也没有，在考场一个月，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张之洞大为不快，讽劝他说：“你的老丈人把十万卷藏书送给朱九江，而不给你，其过在你，是因为你不读书！”

乡试结束后，张之洞不使吴某回榆次，而另调他职。吴某深愧当初不读书，要儿子一定刻苦读书。他的儿子后来学有所成，就是编撰《唐方镇年表》、《北宋经抚年表》和《南宋制抚年表》的历史学家吴廷燮。

猎杀大熊猫的罗斯福儿子



图①

■侯坤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大熊猫，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熊猫热”。此后，外国探险家、动物学家等纷纷来到中国，试图捕捉大熊猫。这些人包括了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和次子科密特·罗斯福。

根据《宝兴县志》和罗斯福兄弟1929年出版的《追踪大熊猫》记载，1926年，罗斯福兄弟来到了中国四川宝兴县，以捕猎独角兽为名，暗中进行大熊猫盗猎活动。兄弟二人很快就成功捕获了一只大熊猫，并偷运往美国。

不幸的是，这只大熊猫在漫长的运输途中染病死亡，罗斯福兄弟只好将它做成了标本，这一标本至今仍被收藏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中。但未能将活体大熊猫带回美国，罗斯福兄弟心有不甘。

1928年，兄弟俩再次来到了四川宝兴县。为了



图②

掩人耳目，他们仍然宣称是在捕猎独角兽，还找来了当地老百姓做向导。但当地百姓发现了他们在捕猎大熊猫后，立即将两人驱赶离境。

他们辗转来到了凉山越西县，终于发现了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因这只大熊猫的体形庞大、凶猛敏捷，罗斯福兄弟不得不放弃了活体捕捉的计划，选择了射杀大熊猫。《追踪大熊猫》这样写道：“我们同时对渐行渐远的熊猫背影开了枪，两枪都准确命中。熊猫应声倒地，但很快又爬起来，跑进了茂密的丛林中。但我们知道，它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罗斯福兄弟开创了西方人猎杀中国大熊猫的先例。

此后，西方探险家开始了对中国大熊猫的疯狂猎杀。美国人赛奇、谢尔登、德国人谢弗、英国人布罗克赫斯特等，先后将罪恶的枪口对准了大熊猫。从1936年至1946年间，从中国运出的活体大熊猫超过16只，流往西方博物馆的大熊猫标本更是多达70余具。

图① 1929年，罗斯福兄弟的英文版《追踪大熊猫》中的插图
图② 1929年，英文版《追踪大熊猫》中的插图